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

第 三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编辑凡例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推动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和核对史料。

二、所撰资料以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主。凡调查研究的成果，现有资料的考证，罕见的原始资料，外文译稿，旧作，遗著，孤本，确有史料价值者，亦酌量选载。

三、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包括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的各方面（据《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征集时限可以顺延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稿件不拘观点，不限体裁。

四、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五、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六、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如有其他刊物转载本选辑所刊载的稿件，请事前告知。

重 印 说 明

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本会暨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现在重印发行。在付印之前，对其中有些文章，由作者本人作了某些修改；对原书中的错、别字以及某些年、月、日和地名、职务等等有错误的地方，由编者作了校正。特此说明。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981年5月

目 录

我所知道的南社.....朱剑芒(1)

杨宇霆督苏纪实.....杨蔚云(32)

徐树铮廊坊被杀的一段经过.....彭仲森(43)

靳云鹗生平.....徐向宸(46)

随陈诚十九年所见.....邱行湘(60)

褚民谊和汪伪组织.....田守成(83)

汤恩伯勾结敌伪的一个例证.....张耀宸(93)

汪伪时期“粮政”梗概.....江楠春(103)

汪伪政权的“南京市青年协会”.....鄂基肇(113)

解放战争初期李默庵指挥蒋军进犯

 苏北解放区的回忆.....罗觉元(124)

南京市参议会的派系斗争.....李清悚(145)

张汶祥刺杀马新贻目击记.....百岁老人江兆鑫口述(157)

风行过百多年的镇江都天会.....杨鼎铭(160)

我与南京市立第一中学.....李清悚(177)

南京清真马祥兴菜馆小史.....马定文(200)

我所知道的南社

朱 剑 芒

在二十年前，“南社”这个名称对当时的文学界来说，一般人都很熟悉的。因为它不仅是旧社会里一个规模较大历史较久的文化团体，并且在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起过相当作用。从辛亥革命前二年（一九〇九年）南社组织成立（那时尚在清政府严密监视下秘密组织的）起，一直到“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的上一年（一九三六年）这足足二十七年中间，曾经有一部分参加南社的人士同不少次有关革命运动的历史事件（主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关系，还有过具体的行动表现。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有生存的南社人士，也可分为三类：最大的一部分，不论在敌人的占领区域或流亡到当时的所谓“大后方”，都过着“遯世不见知”，“苟全性命”的生活；另一部分却走上了甘心从逆，甘心当卖国贼的反革命道路；只有一小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抗战结束到全中国解放前夕，不论归入那一类的南社人士，已有很多死亡，现今还存在的大概不到百分之几了。我参加南社虽在辛亥以后，但因为同南社四位创始人——陈去病、柳亚子、高天梅、朱少屏比较熟悉，而与陈、柳二位又是同乡，更为接近，故对南社的人物以及社内的活动也就容易知道。就今天来说，曾隶南社社籍的人，已日见其少，再过一个时期，也许连“南社”这一名词也不大会有人提到。为了使后一代在研究中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的文

史时多些材料，这里先就我所知道的一些南社资料，简要地把它写下来，以供参考。

记得我在抗战期间，替福建一家小报《人报》写过三四万字的《南社感旧录》，那时又无参考书，全凭脑子回想，想到就写，中间还夹着些不伦不类的断语，这对文史资料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解放后，早就想把有关南社的材料加以整理，但留在故乡的书报和照片已大部分散失，幸而有友人送我一册柳亚子在一九四〇年离开上海避居到香港前所编写、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南社纪略》可作依据。它的内容虽从主观出发，与明末太仓陆书仪写的《复社纪略》完全不同，但亚子是南社创始人之一，始终主持社务（中间有一段时间表示消极，但并非脱离关系），他写这《南社纪略》，正因抗战爆发，最后的南社纪念会也将从此结束，成为历史名词，所以作了有系统的记述，留作纪念。有不少地方，他还暴露了自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所以更可以肯定它内容方面一定的真实性。当前，写文史资料的要求，首先是真实性，我写这篇南社史料，用亚子的《南社纪略》作为依据，这比除了亲自经历之外再加入些“道听途说”的写法，应该说更为翔实。所不足的，亚子已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在北京去世，再不能象写《南社感旧录》有模糊的地方，时常通信请他补正了。

以上作为“引言”。

南社的性质及对南社人物的阶级分析

南社是在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十一月正式成立的，以反对满清政府为主旨。但在当时，孙中山同盟会、徐锡麟光复会等领导的武装革命正接连失败；上海等几个大都市出版的鼓吹革命的

刊物，也是不断的遭到查禁，并将机关封闭，编辑被捕，如苏报案的章太炎、邹容等。因之在南社刚成立时，为了避免清廷注意，不能把革命性的文学组织揭露，当时所订的条例，如第一条只规定“品行文学两优，得社友介绍，即可入社”。更有发起人陈去病用骈文体写的一篇《南社叙》，只写些感时伤逝的词句，看不出一点革命情绪。后来把这篇叙文再一次载在《南社丛刻》第九集上，亚子曾在原文后有如下一段附志：

“右文作于己酉之岁，曾刊入南社第一集中，时胡焰犹张，吾辈自分，将以皇汉遗民终老，故其辞若此……”

在辛亥以后改订的《南社条例》，第一条就改为“本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一直到一九二三年改组为新南社，在组织大纲第一条，方有更具体的规定：“本社宗旨：一、整理国学，二、引纳新潮，三、提倡人类气节，四、发挥民族精神。”从这些条文上可以看出南社的性质决不是单纯地为研究文学而组织，主要还是用文学来宣传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最初用“南社”这个名称，正暗示反抗北方清政府，含有“吾道其南”的意思。

南社成立后，在一九一一年春编印第一次通信录，计共193人；武昌起义前又编印第二次通讯录，为228人；一九一二年编第三次通信录，为421人；一九一三年改称姓氏录为403人；一九一六年冬间编印的重订姓氏录，发展到1325人。三年期间入社的增加两倍以上，可说是旧南社最昌盛时期，以后却没有见过单行本的通信录或姓氏录。在《南社纪略》最后附录里才看到《南社社友姓氏录》，计有1170人。又附有《新南社社员录》只有216人，并且大多数的社员就是旧南社的社友。第五次编印的重订姓氏录比较详细，在825人中有318人都载明当时的工作岗位。依据这一材料分析，在教育界的占29.85%，新闻界21.69%，工商界19.50%，政法界

19.18%，编辑界6.00%，文艺界0.94%，医卫界0.64%，宗教界0.64%，无一定职业的（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当时情况）1.56%。从这个统计，正说明了南社大部分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更有不少出生于地主家庭，养尊处优，过着悠闲生活的人物。他们所以加入南社，在早期总受过康梁维新运动及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影响，辛亥后，看到南北分裂，政治上一片混乱，帝国主义侵略越来越凶，在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找不到光明前途的时候，就会意志消沉，寄情诗酒，因此把这个南社作为精神寄托的组织，在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六年的三年中，入社的特别多，向社内投寄诗文作品也更为踊跃。

旧社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清末废止科举，改从学校出身，他们所走的道路，第一总是当教师，关心时事喜做文章的当新闻记者，喜欢研究某种科学经常写作的当书局编辑。从上面的统计，也可看出南社人物的职业，以当教师、当记者、当编辑居其多数；并且具备了条件，原来当教师的也就很易改行，去担任报馆或书局的职务。当过大学教授或报社主笔的，走向政治界，更是一条终南捷径。这在第五次编的重订姓氏录上就可看到，后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舞台上赫赫有名，但在当时也不过在教育界新闻界活动，再不会想到这正是他们的政治资本。至于具体人物，当本盖棺论定的说法在下文再为罗列。

南社创始人及其骨干分子

“引言”内已提到，南社创始人有陈去病、柳亚子、高天梅、朱少屏四位。实际上南社是一个用诗文来鼓吹旧民主主义革命，团结知识分子，交流中国传统文学，互相砥砺民族气节的组织，具有

爱国思想与文学修养应该是参加这一组织的主要条件。朱少屏虽也是同盟会会员，辛亥以前在上海教育界一般进步人士中非常活动，但他只精通外国文，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在组织南社时，只担任苏络宣传和一些收支款项，印发刊物等工作。真正的发起人和主持人，只有陈、柳、高三人。

陈去病，原名庆林，字百如（巢南、佩忍、病倩，都是他写文字用的笔名）。他是江苏吴江同里镇人，生于一八七四年。他的祖父以商业起家，很有积蓄。但他本人爱好读书，在少年时代即以文才著称。一九〇三年到日本，与孙中山先生相识。回国后，在上海担任《警钟日报》主笔，同时在《国粹学报》上经常发表排满复汉文字。一九〇七年女革命家秋瑾因徐锡麟刺杀恩铭案发，在绍兴被捕殉难，陈与徐自华（秋瑾盟姊）秘密往文种山移运棺木葬在杭州西湖。并组织“秋社”，举行追悼会。被清政府所悉，遂平毁秋墓，彻底追究，他和徐氏分别避往汕头及上海。一九〇九年创立南社时，他早摆脱汕头《中华日报》主报职务，先到北京，再回苏州，担任家庭教师，仍替上海许多革命刊物写稿。因他加入同盟会最早，民国中的中坚分子大半相熟，虽留在苏州，仍和各地广通声气。一九一〇年他又到杭州高等学校当讲师。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上海各大学教书，并同徐自华为纪念秋瑾，创设竞雄女学（竞雄是秋瑾别号）。一度任吴江县志局局长。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病死，北京旧国会恢复，他在参议院担任秘书长。一九一七年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他随伍廷芳南下，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任大本营宣传主任。晚年在南京任革命博物馆馆长。一九三三年七月回故乡举行六十称庆，不久即去世。他生前著作极富，因家中失火，全遭焚毁，刊行的只有《百尺楼文集》及所编的《笠泽词徵》……等数种。吴江垂虹桥原来有座桥亭，因之他又自称“垂虹桥亭长”，

在逝世前曾写有《垂虹亭长自传》，可惜早已佚失，无从寻求了！

柳亚子，原名慰高，字安如。参加同盟会时，即改名人权，再改为弃疾，因自比法国卢骚，又改称亚卢，最后径称亚子。世居吴江北库镇，一八九八年始迁居黎里。他于一八八七年出生在一个地主阶级的书香门第，从他的五世祖起都有诗文著作。他的母亲也是一位女文人，所以他十二岁就会做诗。他最初受了维新运动影响，很倾向梁启超的文字。一九〇三年进上海爱国学社，认识了章太炎、邹容、蔡子民等，开始抱有反清的革命思想。一九〇六年加入同盟会，主编《复报》，又经蔡子民介绍，参加了光复会。为了抨击当时社会上萎靡不振的士习，因以文章气节相标榜而组成南社。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的黄花岗事件发生，革命情绪突然紧张，这时陈其美、宋教仁已加入南社，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文字，为南社张目，于是南社与当时的革命关系，遂为社会所注意。武昌起义后，不到一月，上海光复，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后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公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正式就职，各部成立，南社中有好多人当了次长，亚子也进了总统府当秘书。但他过不惯政治生活，因病辞职，仍回上海任《天铎报》主笔，后来又在《民声日报》、《太平洋报》各担任过一个短时期的笔政。他对南京临时政府撤消，让位给北方袁世凯，最不满意，所以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替友人题画，就有这样一首诗：

和议不曾诛贼桧，群儿今已捧曹瞒；
会须画作中原景，立马昆仑放眼看！

此后，他就回到乡间，在家中写作，除按期编印《南社丛刻》，还印行很多种革命烈士诗文集。革命失败后一些南社人士，也经常留住他家中。“五四”运动发生后，他开始写语体文，倾向德谟克拉西，

在吴江全县各大镇发行了十数种“新”字号的小报，为地方上土豪劣绅嫉视，向官厅告发，说他宣传普罗文学，因之这些报纸悉遭查禁，他就重迁到上海，为了积极提倡新文学，将南社重新改组，称“新南社”。在孙传芳恶势力伸展到江浙时期，他也在被侦捕之列，遂化名为“唐隐芝”。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中央举行清党，他因负责苏省党务，遂亡命日本。回国后，一直住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他虽避居香港，仍在报上发表文字，痛斥蒋介石反动集团不顾人民，逃往重庆过他们的小朝廷生活，后来被重庆方面得悉，竟恼羞成怒，把他开除党籍。香港沦陷后，他绕道回国，住在桂林；胜利后，他又从重庆到上海，再往香港。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他应毛主席电召，回国参加开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使他结束了十数年艰苦备尝的迁播生活，因之他在归国途中就写下“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见光明”的诗句，并且把最后的诗稿命名为《光明集》。他到北京和毛主席第三次见面（一九二六年到广州和毛主席初次会见，第二次系在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到重庆跟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时晤叙），所以他欢欣鼓舞地又写下了“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的诗句，送给毛主席。他虽得到毛主席无比关怀，但由于在过去颠沛生活中一直坚持写作，脑力大亏，终于治疗无效，一九五八年在京逝世。他的遗著包括自己著作与亲自整理编校有关宣传革命、保存地方文献的书籍共有七十余种，约计在一千卷左右（居香港时尚编有《图南集》及所辑《南明史料》千余卷，均为敌寇炮火所毁，不计在内）。据一九四四年朱荫龙在桂林替他写的年表，曾云：一九四〇年未离上海前，他还自撰《羿楼年谱》，分载在《宇宙风乙刊》，原稿早失，已无可访求了。

高天梅，原名垢，改名堪，再改名旭，字钝剑，写诗的笔名除用天梅外，亦称剑公或慧云。他出生于江苏金山县张堰镇一个地主

家庭,年龄比柳亚子略长几岁。他在少年时代就醉心革命,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发动反帝斗争,唐才常、桂圭乘机在汉口发难,失败流血。他听到消息,非常愤激,写有“汉儿发愿建新邦”之句。一九〇四年留学日本,即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担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并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这是继章、蔡、邹爱国学会的一种革命组织。因之同样被清吏端方注意,要将他逮捕,迫使解散健行公学,避居乡间。一九〇九年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他虽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但在当时他的声名确比去病、亚子为大,为了避免清政府侦伺,就使他不能参加。直到辛亥革命上半年,在上海举行南社第四次雅集,他才首次出现。后来他在南社第七次雅集(一九一二年十月)时,为了编辑丛刻的一些小问题,与亚子发生误会,酒后大闹意见,从此与亚子避不见面。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既死,黎元洪恢复旧国会,因他当选了众议院议员,就常住北京。一九一六年北方军阀集团逼迫黎元洪再度解散国会,大部分议员径赴广州,他亦无所表示。一九二二年黎元洪复任,仍将旧国会恢复,当六月中旬南社在上海举行十八次雅集,他又突然参加。张心抚(旧国会众议院秘书,在袁世凯酝酿帝制时离京南下)在席上加以讥诮,但他态度自若,毫不介意。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总统,他竟公然受贿,当了“猪仔议员”。所以在沪的南社人士征得亚子同意,联名登报,把他驱逐出社;他的叔父高吹万因深恨他丧失民党人士气节,与他断绝关系。他在这众怒难犯的情势下,只有闭门家居,郁郁两年,于一九二五年在乡病歿。在一九一四年《南社第九集》出刊,曾载有一篇去病作的《高柳两君子传》,高即指天梅,文中对他非常推崇。辛亥以前,高柳二人的革命思想,写作才能,确可相提并论;就高谭雄辩的口才上讲,柳有口吃毛病,高学过法律,初光复时,还担任过金山县司法长,柳远不及他。后来他二人所趋途径完全不同,去病也对

人说过“替别人作传，生存的不如死的好写”，这句话含有“盖棺论定”的意义，是非常正确的。

上面介绍了南社三位发起人，底下再简略地介绍几个骨干分子：① 朱少屏，原名葆康，亦称屏子，上海人。辛亥后，组织寰球中国学生会，任总干事及日夜两校校长。他善于交际，民党中熟人很多。但在“五四”运动后，和北方军阀政府通声气，反对学生爱国运动，上海青年学生都对他不满。他在南社内最为活跃，几乎每次集会都参加。他又是著名的“上海通”，亚子少不了他（如吴铁城聘请亚子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亚子就提出非请少屏任副馆长，不然决不就聘）。抗战初年，他在菲律宾任副领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被日军枪杀。② 叶楚傖，原名宗源，后改名楚傖，字小凤，吴县周庄镇人（辛亥前后周庄曾划归吴江，所以他亦称吴江籍）。武昌起义前，因宣传革命，被当局注意，曾一度避居亚子家中，与亚子关系极深。辛亥后任《太平洋报》总主笔，后为《民国日报》主持人。孙中山逝世后，为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重要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后，与南社旧友即少往回。抗战结束，由重庆抱病回乡，殁于上海。③ 姚石子，原名后超，改名光，字凤石，江苏金山县人，与高天梅为中表兄弟。他加入南社最早，但经常住居乡间，辛亥前后从未担任过上海新闻界或教育界职务。但他与亚子友谊极深，对南社的爱护，始终热烈。在民国初年，亚子和吹万、天梅叔侄几次发生意见，都由他居间调停。一九一七年亚子与朱鸳雏为宋诗问题，大闹意见，但他并不袒护“松江派”，始终以调人自居。因之中间有一段时间，由于亚子态度消极，南社主任一席，就请他担任，直到新南社产生为止。《南社丛刻》最后两集亦悉由石子负责编辑，因未中断。

在南社骨干分子中，除上列三人外，虽尚有山西景耀月，湖南宋教仁、宁太一，浙江朱宗良，福建林秋叶，安徽胡朴安、胡寄尘等，

对于南社活动的发展，亦曾起过推动作用，但有的为时极短，有的比较琐碎，就不再列举了。

南社的两种前身

辛亥以前，一般知识分子倾向革命，宣传抗清的民族独立运动思想，以创办学校，组织报社，实是一条最主要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如徐锡麟在绍兴办大通学校，秋瑾在上海刊行《中国女报》，培养革命青年，组织革命力量，都含有重大意义。接着就有章太炎、邹容、蔡子民、吴稚晖组织爱国学社，浙江亦有励志学社、改进学社等创设。南社人士以高天梅所创的健行公学为最早。所谓南社的前身，实际上却是《国粹学报》与《复报》两种组织。这两种报，论它们的革命立场，以攘夷复汉的文字作广泛宣传，本是一致，但它们的对象有所不同。《国粹学报》由国学保存会编印，当时的一般士大夫阶级以及对中国旧文学有相当造诣的知识分子，即使思想开朗，其爱好旧文学也不会有所转变，“保存国粹”是他们所最爱听的。而年青的知识分子，旧文学根柢较浅，读到过于深奥的文学，会不感兴趣。这在南社未创立前，章太炎为邹容作《革命军》序言里有一段话，正说明了这种情况：

“蜀邹容为《革命军》草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借，……嗟乎！世皆瞶昧而不知话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击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

因之《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文字，多数是阐述明末遗民顾炎武、

王船山的民族思想，表扬陈卧子、夏完淳英勇不屈的气节，并且写得非常古朴。由于国学保存会是邓秋枚（名实，广东顺德人）所发起的，他是个有名的古文家，又是藏书家、考古家，所编印的除《国粹学报》，还有《国粹刊书》、《古学汇刊》、《神州国光集》等，曾风行一时，大家都认为复古运动，并不加以注意。而《复报》却是明目张胆地揭出排满宗旨，高举革命旗帜，只看它封面“复报”二字，写的是反文，正表明了反清的刊物。文字非常激烈，“逆胡”、“虏廷”、“贼满人”、“载湉小丑”等名称满纸都是。为了隐蔽报社地址，封底的印刷所、发行所都假托在日本东京，当时社会上稳健的知识分子，就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书刊；但青年人很对胃口，虽然不能公开，而秘密订购，秘密阅读的也很多。《复报》除载一些旧体诗词，门类较多，如“社说”，“传记”，“批评”，“评丛”，“小说”，“音乐”，文言白话间用，浅近易读，这对吸引读者，也起了极大作用。

何以说《国粹学报》同《复报》是南社的两种前身？因为《国粹学报》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是邓秋枚，后来邓虽没有加入社籍，但据亚子《南社纪略》中说，当南社正式成立前二年，酝酿组织，邓也参加。而陈去病、高吹万、蔡哲夫、黄滨虹、胡朴安……都是国学保存会会员，也是《国粹学报》的主笔或中坚分子（吹万还组织国学总会，后来朴安任民报社社长，也大谈国学，编印不少国学书籍，如《朴学斋丛刻》等）。至于《复报》的主编人正是柳亚子，他的作品虽经常用“弃疾”或“亚卢”两个笔名，但他在好多期上连续写的“中国灭亡小史”（从满清入关起写到光绪末年）却自署“中国少年之少年”。这时他刚二十岁，也是初次见到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光复会的一年。不但去病常在《复报》上发表文字，而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后来参加南社的人士，如吹万、天梅叔侄、马君武、刘季平、傅钝根……等。《国粹学报》同《复报》在文字的精神实质上讲，虽说是殊

途同归，但“国学派”中在“五四”运动后，也很少见他们提倡新文化，写过白话文。直到旧南社结束，新南社产生，他们还是这样，在文学上的保守思想很坚决，不过也并不反对亚子的革新主张罢了。

南社初成立时在社会上的影响

南社组织的酝酿，根据柳亚子《南社记略》中“我和南社的关系”第一节所述，是在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冬天到一九〇八年春天的一个时期，后来搁置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直到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宣统元年旧历月十初一），才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至于南社初成立时，对于社会上的影响，就我个人从吴江黎里乡镇上所见到的情况来说，并不象前三年亚子在上海主编《复报》时那样大。《复报》的创办人田梓琴（名洞，湖北蕲春人），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这时亚子同陈去病亦已相继参加了同盟会，高天梅还担任了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其余执笔的绝大部分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因之，当时的《复报》和傅屯艮（原名熊湘，后改名专，涨南醴陵人，同盟会会员）创办的《竞业日报》，革命先烈秋瑾主办的《中国女报》，都成了同盟会在上海宣传革命的喉舌。由于亚子的关系，这些刊物继续传播到乡间，三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都喜爱阅读，尤其是不到廿岁的青少年，那怕受古老的封建家庭的约束，不许把这些刊物放在家里，认为“大逆不道”的文字，会招致灭门之祸。但越是禁止，越是偷偷地借来阅读，成为一时风气。一个小小的黎里尚且受到巨大影响，时全江苏全省的许多大城市里，由于这些刊物，使革命思想广泛散布，那就更可想象的了。所以《复报》只发行十一期（每月一期），就被两江总督端方下令禁止发行，还想通